

鲁迅的书法家承谁？

如 月

鲁迅是最早书法协会的会员。对于鲁迅的书法，论坛上有一些纷争：有人说他就是简单写字而已，也有人说，鲁迅的书法自成一体，是一种高妙的存在。

关于鲁迅文学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而对于鲁迅的书法，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者有独到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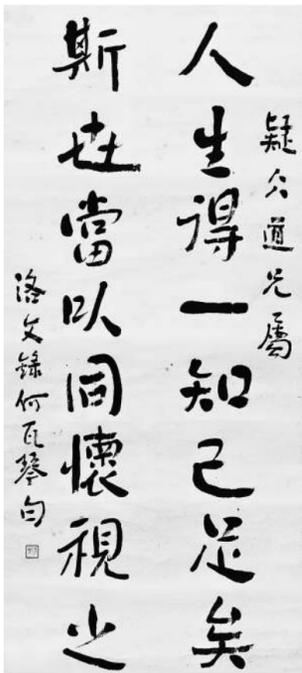
“远逐宋唐，直攀魏晋”

鲁迅存世的文化遗产中，各类手稿可算是价值最大，也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笔笔最是值得世人称道。出于对艺术的爱好和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的熏陶，我顺着鲁迅书法艺术这条线探索下去，对他的书法风格的师承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在鲁迅一生的书写史上，除家学之外，影响较大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他幼学时期的老师寿镜吾，一位是他的经学老师章太炎，而形成他成熟的书法风格的直接原因还在于他大量的抄碑活动。

鲁迅幼年时所尊敬的塾师寿镜吾先生对他的影响是最具启蒙意义的。鲁迅从11岁起到三味书屋读书，共在三味书屋学习5年。他称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从鲁迅的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可以看到寿镜吾先生的严厉，鲁迅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书法方面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寿镜吾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而这也正是鲁迅读书的爱好。

鲁迅喜读魏晋文章，赞赏魏晋名士的风度，这是他后来着力研究嵇康、阮籍等名士的原因之一。汉魏六朝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时期，从鲁迅后来对汉碑及六朝墓志的收藏，能看出他对这一时代书法作品的爱好与重视。而鲁迅的书法也透着汉魏风骨，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鲁迅的书法艺术“远逐宋唐，直攀魏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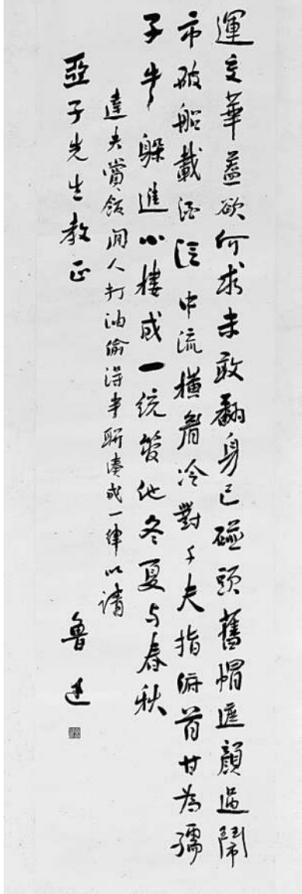


▲鲁迅书赠秋白条幅

书法家从章太炎

对鲁迅书法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鲁迅在日记中以“章师”来称呼自己的老师。鲁迅1902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听章太炎讲段氏《说文解字注》《小学》等，他那时的文艺修养，是中西兼修、古今交融的。鲁迅的旧文学，本就很渊博，很笃实，经过章太炎的这一番启发，境界更进一阶了。

鲁迅对章太炎非常钦佩，对他也是非常尊敬，曾评价章太炎“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尤其被章太炎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所折服。章太炎的书法是尚碑的，鲁迅的治学与书法的碑派倾向都深受其影响。鲁迅还藏有章太炎送给他的一幅珍贵的书法条幅，内容是“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阮满阮。徐邵守神，以物为量。书赠豫村章炳麟”。此条幅内容取自《庄子·天运》，这段话是鲁



▲鲁迅书赠柳亚子《自嘲》

迅和章太炎师生二人都喜欢的句子。鲁迅得此书法的时间是1915年6月17日。当时章太炎被囚禁在北京，作为弟子，他多次去探望老师，可以看出彼此的感情之深。后

来他在给朋友曹聚仁的信中写道：“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鲁迅对章太炎一直是非常热爱和敬重的。

章太炎擅长篆书，曾以篆书作版书讲课，从鲁迅的手稿笔记中，艺术风格能明显看到太炎的影子，可见鲁迅是以章太炎书法为楷模的。

乾嘉学派的遗老

章太炎的老师是俞樾，俞樾为清道光年间进士，经学大师，工书法，篆隶尤为擅长。俞樾的老师是阮元，他们都属清朝“乾嘉学派”一脉。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的学风是：言必有据，文章朴实，又称汉学、朴学、考据之学。乾嘉学派有一个分支，称为“扬州学派”，以阮元为代表。

阮元是乾嘉学派后期的杰出代表，“笔法劲道秀，往往画不出锋，犹如汉隶”，倡导碑学思想。由于扬州学派的巨大影响力，又因为当时的许多学者同时又是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直至清末碑学集大成者康有为，把碑学思想付诸书法实践，形成了一种带有朴学学术影响的碑派书法。阮元去世后，俞樾仍沿袭阮元的碑学书法理论，师法唐碑，形成风气。

鲁迅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于颜体和北碑兼备，悟得其中真谛，其笔法、章法等完全含蕴在日常自然的书写中，他的手稿，书写得更加精致，用笔上更加洒脱，文人气质更足，用笔不拘一格，充满了个人情感，起笔上藏露结合，含蓄内敛与舒展飘逸相结合，笔笔精准，洒脱自如。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道出了学术的发展不能囿于门户之成见。书法的发展同此道理，它作为最初记录语言和文字的符号，经过数千年文人们代代相传的演绎，成为一个艺术门类。

师承是书法发展的脉络，而不断的个性探索形成了纷繁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民国文人的学术圈里，鲁迅是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书法家。用乾嘉学术与书法思想的脉络来贯穿，从阮元到俞樾到章太炎这条碑派脉络承袭下来，书法家的鲁迅可称为乾嘉学派的遗老。（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郑振铎酷嗜旧书

顾 燕

叶圣陶为郑振铎的《西谛书话》作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得弗得了’。”

郑振铎每次经过书铺门口，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踱了进去，然后就是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什么刻本，“非常之好”“好得弗得了”。叶圣陶说：“我爱他那‘弗得了’的高兴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

一天晚上，书友陈乃乾打来电话告知郑振铎，苏州某书商最近发现了32册的元剧，有刻本也有抄本，书主要价千元。郑振铎听罢，激动万分！他急切地嘱托陈：“一定要帮我买下！”

郑振铎好旧书，其实是在保存民族传统文化。他服膺龚自珍“狂飚文献耗中年”的话，把搜集和保护民族文献视为己任，藏书成了他的癖好。他在《〈丛书目录〉序》中说：“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

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籍。”

淞沪会战以后，为了保全民族文献，郑振铎留居上海8年。郑振铎说：“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暖，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收藏旧书对个人治学也极有帮助，鲁迅对郑振铎的治学和藏书颇为赞赏。鲁迅在致白静农的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甚为学子所珍贵，宜也。”

毛泽东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见到郑振铎，听人介绍郑振铎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在祖国的文物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对郑振铎说：“人民把文物工作委托你了。”



郁达夫点拨刘开渠

王 剑

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导刘开渠走上雕塑艺术道路的故事，广为流传。

1923年2月，郁达夫到北京大学任教。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兼课。有一天，闲来无事，美专的几位老师聊起班里的学生，公认一个叫刘开渠的学生最为勤奋，也最不修边幅。郁达夫初来乍到，插不上话，但他记住了刘开渠这个名字。

后来，有几个学生来访。一个“个子很高，满头长发，脸骨曲折，有点像北方人”的青年，引起了郁达夫的关注。一问，才知道这个青年人就是刘开渠。

刘开渠很内向，寡言少语，说话不大流畅，脸上时常显露出苦闷的样子。郁达夫凭借作家的直觉，认为刘开渠颇有个性，“从他的衣衫的褴褛，面色的青黄上望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头苦干，边幅不修的精神来……像他那样的人，学洋画还不如去学雕刻；若教他提锥运凿，大刀阔斧地运用起他全身的体力和脑力来，成就一定还要比捏了彩笔，在画布上涂涂，来得更大。”

刘开渠和郁达夫熟悉之后，二人越谈越投机。当时，刘开渠在大学学的是油画专业，郁达夫对艺术的独特见解，让他豁然开朗，随即作出了艺术转向。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开渠随后去了法国，师从世界著名雕塑艺术家朴舍，学习雕塑艺术。学成回国后，刘开渠到杭州任教，与郁达夫又成了时常往来的师友。每每刘开渠的雕塑作品问世，郁达夫都会大加赞赏，认为这些雕刻“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道劲的，表情是苦闷的”“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完全是他的整个人格的再现”。尤其是刘开渠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们修建纪念铜像铸成后，郁达夫更是不吝赞美，认为“这是有良心的艺术品”，是“何等富于实感的杰作”。

当然，刘开渠最终没有辜负郁达夫的厚望，创作了很多经典作品。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主题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欢迎解放军》《支援前线》，以及《毛泽东选集》封面上所使用的领袖浮雕肖像，都出自刘开渠之手。



季羨林爱猫成痴

周 星

季羨林是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爱猫成痴，前后养了许多只猫。他最喜欢的就是一只白色混种波斯猫，全家人给这只猫起名叫“咪咪”。

有一次，著名诗人刘征带了几位朋友去拜访季老，大家相谈甚欢。突然，那只叫“咪咪”的波斯猫，一闪而过，用嘴咬住了季老的裤脚管，用毛茸茸的身子往脚边蹭来蹭去。季老饶有兴致把猫抱在胸口，爱意满满地对友人们说道：“我们家的成员，除了‘万物之灵’的人外，就是这些非万物之灵的猫了。一到晚上，只要我一上床躺下，这只名叫‘咪咪’的波斯猫，就连忙跳上床来，睡在我的被子上。如果我半夜里醒来，‘咪咪’没有来的话，我就往往难以入睡。白天，我出门散步，‘咪咪’就跟我后面。我上山，它也上山；我下山，它也跟着下来。这在北大燕园已经成了一条著名风景线了。”说话间，那只猫咪又回过脸，瞪大了圆圆的眼睛注视着那些友人。这只猫看见陌生人，也完全不躲避，让去拜望他的友人惊喜莫名，乐不可支。

除了“咪咪”以外，季老还养了一只平常的土猫，因身上有虎皮斑纹，所以起名叫作“虎子”。“虎子”脾气火爆，从不怕任何人，唯独就惧怕季老。

因此，无论家人怎样抱怨，季老对猫都痴心不改。他爱猫成痴，写了许多关于猫的文章，还在文中一起分享他从养猫过程中体验到的“人生感悟”，成为了文坛的一段佳话。



吕其明创作《雨花祭》

周惠斌

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曾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并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深受喜爱，先后获得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综合类最佳创作奖、“七一勋章”等荣誉。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在1945年于南京牺牲，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中，有专门介绍他的内容。1998年11月，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一行3人，前往吕其明家拜访，邀请他为纪念馆创作背景音乐。吕其明毫不犹豫，当面承诺：“我是烈士的后代，为烈士纪念馆创作背景音乐，义不容辞，一定把它写好，分文不取。”他希望能再到纪念馆瞻仰学习，并提出：一是以普通文艺工作者、烈士后代的身份去学习；二是不要搞高级宾馆，不参加宴请活动；三是不接受媒体采访。

1999年1月，吕其明在南京一个部

冀朝鼎：“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叶介甫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这是我国著名外贸经济学家冀朝鼎在清华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是他毕生奋斗、振兴中华的真实写照。冀朝鼎1903年生于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建昌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美国留学时加入美共，回国后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做党的地下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的友谊，曾担任过邓颖超的秘书兼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从事财政和外贸工作，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出国访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财政和贸易方面的杰出人物”。

研究拟定对外贸易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以其卓越的经济才能和杰出的外事活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深切地懂得，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而开展对外贸易，增强友好往来，则是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方略。因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冀朝鼎就提出并拟定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措施。

贸促会初建时，冀朝鼎就积极倡导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当时我国外贸工作尚未开展，这项工作并不为

人们所重视。随着外贸工作的开展，仲裁处在处理外贸事务争端、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健全外贸经济立法等方面，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冀朝鼎还创办并主持了贸促会研究室的工作，最早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动。在当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从事此项研究，也确是深谋远虑，慧眼独到。

1957年4月，冀朝鼎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当时的西德参加东亚贸易会并参观了汉诺威博览会，回国之后即刻组织代表团同志们起草了综合性的考察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干部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经济发展、多建立技术资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加强技术情报研究和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和主张。并提出应立即开始对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研究，培养干部队伍，以便一旦同这些国家建交后，尽快开展外事工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些建议未能实现，但历史的进程再一次表明，冀朝鼎是有远见卓识的。

“侵犯打火机专利权”事件

在外事活动中，冀朝鼎机敏果敢、坚持原则。1959年，冀朝鼎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赴中欧某国举办展览。展览馆开幕之后，每天都有大批友好人士前来参观、洽谈，但

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起所谓“侵犯打火机专利权”的事件。

一天，这个国家的首都警察局派出4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展览馆驻地，出示出庭通知书后，要展览馆负责人签字，保证于翌日10时到庭受审，否则，立即拘捕。冀朝鼎得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预谋挑衅活动。如签字受审，就会损害祖国的尊严，如不签字，4名警察就守在办公室的外面不走。这时他正好有一个宴会必须马上动身出席。事出意外，情况紧急，在场的我国工作人员暗暗着急。但冀朝鼎却沉着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能在出庭通知书上签字，更不能出庭受审，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话音刚落，警察已走了进来。冀朝鼎立即站了起来，严正地对警察说道：“我是代表团团长，现在要去出席联邦银行的宴会，有什么具体事情请你们去找馆长。”说着，伸手拉着展览馆馆长李兆离出门上了汽车。当警方回过回头来找馆长时，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告诉他们，馆长因公外出，不在馆里，4名警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在联邦银行的盛大宴会上，应邀而来的各方面人士盛情款待，中国客人。当宴会主人致祝酒词之后，冀朝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且神情肃穆地说道：朋友们、女士们，当诸位在此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我们的友好合作举杯祝酒之时，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在贵国首都刚刚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人民很不友好的事件……为两国

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投下了阴影……

顿时，惊诧和愤懑代替了宴会上欢快的气氛。这些国家政权的操纵者——金融界巨头和实业家们担心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发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纷纷向警察当局提出质问，但事态并未停息。展览馆的同志从冀朝鼎的安全着想，劝他立即离开险地。我国使馆也指示展览馆的有关人员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再办交涉。

冀朝鼎坚定地答道：我们是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来发展贸易关系、促进友好往来的代表使团。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损害、无理的起诉没有撤销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离开！他宽慰同志们说：我持有外交护照，警察当局不敢违反国际公法，动我半根毫毛。

在冀朝鼎的领导下，展览馆的全体同志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迫使阴谋制造者撤销了无理起诉，这个国家的内政部长还亲自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代表该国政府表示歉意。这件事的处理，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保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示了冀朝鼎高超的斗争艺术。

1963年8月，冀朝鼎准备率领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他按照多年的习惯，和党小组长商定，临行前再参加一次党小组的生活会。不料，在会前4小时，即8月8日中午12时，突患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内，经抢救无效，于次日中午1时25分不幸逝世。

冀朝鼎逝世后的3天之内，治丧委员会就收到了来自22个国家团体和个人的吊唁函电150多件。正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所说的：冀朝鼎“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不愧为无产阶级的一名英勇战士。”